

论歌德对启蒙理性的疏离与超越

王红莉

(陕西教育学院 中文系, 西安 710061)

[摘要]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向自然和感性回归观点的影响, 其代表人物歌德的创作表现了对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的疏离; 歌德从浪漫到古典的转变又呈现出创作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完成了对法国启蒙理性原则的超越。

[关键词] 法国启蒙运动; 狂飙突进运动; 歌德; 浮士德; 理性; 感性

[中图分类号] K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08)01-0121-03

以往我们在评价歌德时, 往往引用恩格斯的著名论述: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 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 而后者却不得不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 歌德有时非常伟大, 有时极为渺小; 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 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1] 恩格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 指出歌德身上的“鄙俗气”和妥协性同他的阶级出身的必然联系, 也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指出歌德在政治上的软弱性、矛盾性和局限性。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 当我们换一种角度, 从文化史的眼光, 从人摆脱宗教神性的束缚而追寻自我的解放和发展的角度看, 歌德身上的这种多重性、矛盾性又恰恰是他为摆脱精神束缚, 追求人生的多重体验, 追求自我人格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歌德不是一个阶级论者, 甚至也不是一个民族论者, 因为“他所受的教化是世界性的, 使他没法太爱国”,^[2] 所以他只是一个人性论者。正如比学斯基所说, 歌德的人生“从容自然得像一朵花的展开, 像种子成熟, 树干上升, 绿叶成盖”。^[3] 显然, 歌德是要让自己, 同时也是让人在一种既无宗教压抑、又无阶级纷争的“自然”氛围中自由地展示人生, 追寻人性的完整、丰满和自由。由于文艺复兴发现的主要是感性意义上的

“人”, 而启蒙运动主要发现的是理性(知性)意义上的“人”, 所以歌德对人性的这种独特的理解, 对自我人格的全面性追求, 显示出他在“人”的观念的理解上对文艺复兴的理性的契合与贴近、对启蒙理性的疏离和超越。

(一)

18世纪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 狂飙突进运动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在德国却正聚集起一股新的反叛力量。它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 认为理性主义把感情的自发性、人的个性、天才的灵感从属于古典主义理性化规则是法国文化霸权的体现。^[4] 赫德“批评启蒙时代是个盲目崇拜理性的时代。”^[5] 狂飙突进运动因而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先声。青年歌德作为狂飙突进的主要成员, 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集中体现了这些情绪。

其实最早对启蒙哲学阵营进行反叛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与法国启蒙作家虽都崇尚理性, 但除了和伏尔泰等人一样强调“天然的”、“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即知性能力)之外, 还特别强调宗教与道德意义上的, 存在于人的“自然状态”的“天赋良知”。这种微妙的差异导致了日后卢梭与法国启蒙学派的分裂。卢梭提出的关于“自然”与“文明”的对立, 实则是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他还由此进一步提出了人向自然的回归, 向感性的回归, 从而显示出他与理性主义的抵触

和同启蒙阵营的疏离。卢梭在人性理论上拨转了从17世纪开始的单向度地朝理性维度发掘与发展的方向, 开始了力图使人的理性本性与感性本性二元发展的努力。前面提到的狂飙突进运动, 也是从卢梭的感性理论中获得思想动力的。这必然会对年轻的歌德的世界观和人文观产生极大的影响。

此外, 歌德与卢梭在对“自然”的理解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卢梭倾向于把“自然”看作道德上的人性之善, 更富有理性意识。即使是强调情感抒发, 他也总是让人的善性或“美德”去驯服情感的烈马, 不使其越道德规范之雷池。在《新爱洛伊丝》里, 他除了描写男女两性之间的真挚之爱, 还描写人与人之间基督般的广博之爱。圣普乐与朱莉及他们周围, 不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是充满爱心和美德的人, 从中可感受到卢梭创作中浓浓的基督情怀。卢梭认为, 人性本善, 人本身有神性, 但人必须认识到人性有被污染的可能与必然, 人依旧可能是有罪的, 罪感由此而生, 因而人仍需救赎, 只不过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救赎。所以卢梭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更温情、明智与道德化。^[6]

而歌德在“自然”的理解上更倾向于人的感性欲望, 他的热情多于理智。歌德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时, 对基督教强调原罪及悔悟非常厌恶, 他宁愿犯罪也不忏悔。^[7] 所以歌德及其笔下的人物更显得激情、狂放与世俗化。《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书信体更

模仿卢梭的《新爱洛伊斯》，但不颂扬美德对自然本能和感情的胜利，而是描述感情如何经历它命中注定的过程，这恰恰流露出歌德自己的强烈情感和感性欲望。歌德曾爱上他朋友的妻子夏洛特，遭对方拒绝后，歌德近于疯狂，后来他借创作抒写这段刻骨铭心的爱。小说内容新颖，描绘并唤起了诗一般的意境和感受。勃兰克斯称它“包含了《新爱洛伊斯》的一切优点，却没有它的任何缺点；它激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在整整一代人中引起了强烈的热情和对死亡那种病态的向往”。^{[6] 22}歌德在“人”的问题上比卢梭更亲近于古希腊式的原欲，而更疏离于希伯来—基督教式的“原恶”。

(二)

歌德一生几乎都在追寻一种自然本真的生活，凭自然感性的生命冲动去体验自我和世界。在莱比锡大学法律期间，他的阅读范围就非常广泛。甚至研究过神秘主义、炼丹术及幻术，尝试学木刻、热衷绘画、建筑，忙于政治、戏剧的改革，对哲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学习和研究物理学、化学、解剖学、植物学、气象学，以至我们很少有人知道歌德在科学研究与著述上所花的时间，要超过他从事文学著述所花的时间。一生恋爱数次，见诸文字的就有十三次之多，73岁时还爱上一位17岁的少女。也许下述关于歌德的评价深中肯綮，“他是一位有研究科学热忱与开放心灵的业余者，一位纵身于诗歌、小说、爱情、艺术实验与行政琐事之间的科学家。”^{[2] 965}

这种凭借生命欲望而生活的方式，使歌德成了一个人生体验丰富、人格丰满的人，也使他成了一个激情而善感的人。他一生都全身心地游历于纷繁多变的世俗浊流中，不断在新的生活、新的体验中找到情感与欲望的新的寄托。传记学家比鲁斯基对此有十分深刻的分析：“使他的一切幸福皆不能美满的，就是每一种需求达到满足时他立即再往前追求着其他新鲜的。这种向前进展的欲望固然是一般不肯庸俗自足的人所同具的。不过在他这种情感禀赋里格外觉得强烈深挚。所以他一生很像浮士德，在生活进程中获得苦痛与欢乐，但没有一个

时辰可以使他真正满足。”^{[3] 70}正是他那张扬人的生命意志和自然欲望的人文观念，才使他的创作超越了同时代作家的“人”的观念。

歌德23岁开始写诗剧《浮士德》，83岁完成此剧，其间凝结了他无与伦比的智慧、灵感和想象力。“该剧向近代人展现了但丁在他的《神曲》中向他在14世纪的同胞们所展现的，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浮士德》把我们这个时代所存在的问题通过道德历险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里面的每一个困难、每一个问题都是至今仍然困惑近代科学界的；也都是可以在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中得到共鸣的。”^{[7] 261}

浮士德是一位对生命有着种种渴望的学者。他知道解救自我的方法不在于从书中寻找理论而在于实践。在邪魔魔鬼靡非斯特的指引下，他投身于一个充斥着生命实践的世界当中。他尝试过世俗的欢乐，感官上的爱情，有过大权在握的时候，也有过追寻古典主义美的经历。但是，所有这些经历仍然不能让他满足。最后，他在为他的同胞们效力这一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上寻找到了满足。但是，这也只不过是奋斗起点，并非终结点。奋斗探索之路本身就是目的，生命的开始就是它的终止，我们只不过要好活下去而已；完美不是我们所能企及的领域，真正的完美也就意味着静止和死亡。因此，我们所能取得的最高的成就，就是高贵地活着，不懈地创造生命的奇迹。这也是最后能够拯救浮士德于死亡和打败魔鬼靡非斯特的原因；也是全世界任何阵营都喜欢浮士德的原因。^{[7] 271}

(三)

歌德用毕生的经历探索并塑就了浮士德，浮士德也概括了歌德一生的生活体验。浮士德，当然就是歌德。他也像歌德一样，年届花甲，仍对女性的温婉与美质有着极锐利的感性。他对智慧与美的双重热望，正是歌德灵魂的写照。

第一部的开始，浮士德博士在中世纪书斋生活感受到焦虑和苦闷，由于长期地远离现实生活，生机勃勃的生命本源备受压抑，自然欲望无法实现，他甚至准备自杀来结束这无意义

的生活。靡非斯特许诺满足他的自然欲望，浮士德遂放弃了死亡的念头。所以浮士德和魔鬼打赌并不是无条件地出卖自己的灵魂，靡非斯特必须能够展示一种他欣然接受并愿永远保有的欢乐，他才同意进地狱。浮士德就是按这条件，以他的鲜血签下了契约，并呐喊道：“让我们在感官的深渊里，去解燃烧的情欲的饥渴！”^{[8] 90}

随后，靡非斯特就把浮士德带向玛格丽特——也就是歌德在法兰克福曾经爱过的格瑞森。浮士德在她身上找到了那单纯所具有的智慧的魅力，并向她求爱。当然浮士德并非仅仅为了满足感官的享乐，而是为了在实现自然欲望过程中体验欢乐，同时也体验痛苦，从而充分感受生命的自由，实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浮士德说：“听着，这儿讲的并非什么享乐。而是要陶醉于最痛苦的体验，还有由爱生恨，由厌倦生活跃。我胸中对知识的饥渴感已治愈，不会对任何的痛苦关闭封锁。整个人类注定要承受的一切，我都渴望在灵魂深处体验感觉……”^{[9] 90}在歌德的理解中，自然欲望不管向善还是向恶，都是人之生命的本原，只有自然欲望的存在并不断地运动，才构成了生命的运动，才有人类的存在与生命的意义。

第二部开始，浮士德到宫廷为皇帝服务，并非出于什么政治变革、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抱负，而是试图寻找一种人类精神的新的体验。所以他只能竭尽曲意奉承之能事，尽量满足皇帝与大臣们的享乐欲望，沉湎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之中。正如同歌德在魏玛的那段经历，虽然魏玛很美，但宫中琐事愈来愈教他难受，他没法始终亦步亦趋地随同公爵打猎、玩女人。他自己感到必须摆脱那些枷锁，找寻新的方向与远景，于是离开魏玛前往意大利旅游。^{[2] 862}同样这种宫廷生活的享乐也没能使浮士德感到满足，但却实现了他又一种世俗欲望的体验。

全剧中最好的一幕是关于海伦与浮士德的结合，歌德在此最后一次到达诗艺的巅峰期。他将戏剧与音乐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复杂的寓言故事中的人物真实的生命，以适应近代人的心智状态。海伦一上场，就以她优雅

的风姿，流转的秋波，征服了男人。像所有被蛊惑的男人一样，浮士德把他在法术与战争中获得的权力与财富全部奉献于海伦脚下，以期获得和她的结合。从中也透视出了歌德创作后期对古典美的心仪。此时的歌德在创作上已由狂飙突进运动时期对自由的浪漫追求转为对希腊古典风格中的理性、节制与秩序的向往。歌德在希腊的文化与艺术里，只看到了“阿波罗精神”——形式与节制的高扬，几乎忽略了那使得希腊的宗教与生活染上丰富色彩的“狄奥尼索斯精神”(Dionysus)，其实在歌德的爱情中，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始终洋溢着狄奥尼索斯的那种奔放的狂热。他对古希腊古典美的热爱，仍然带有浪漫的色彩。^{[2] 865}所以歌德的创作表面看似回归古典，实则未离浪漫主义的神韵。

最终浮士德移山填海的事业生活，依然是他从自我的角度去体验世俗生活，领略人类精神所做出的个人选择。他的“智慧的最后的结论”是：“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着，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3] 670}这里的“自由”不是人在世俗权威面前的人身自由，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意志的自由，个体的人的精神独立与自主。拥有这种“自由”的人，才能每天不满足地去体验，同时也是永不满足地去开拓。显然，这“智慧的结论”展现的是浮士德无限扩张的自我意识，是典型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或个人主义。作为文学形象，如此狂放地张扬个体本位、放纵自我，在西方近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个。这不仅体现了从传统文明中觉醒过来的欧洲近代人的一个人格侧面，而且也昭示出歌德晚年的哲学道德观发生的变化。在充满青年的活力与傲气的时日，他认为生命纯粹是供自我发展与表现的舞台。随着不断地成熟，他觉察到人生是一个和他人合作的过程。个人的生存要靠互助来维持，尽管自我追寻的活动仍是生命的基本动力，然而必须受到群体需要的束缚。因此，第一卷的浮士德就是个人主义的体现；在第二卷中，他发现了经由为善来达成灵魂的“超度”。^{[4] 909}

浮士德永无止境的世俗化的精神追求，彰显了古希腊、文艺复兴前期

的人本思想；体现了从信仰时代的宗教阴影中走出来的近代欧洲人的精神特质；他那扩张的自我和强烈的自由意志，预示了近代欧洲个体本位、个人主义新价值观念的形成，预示了一个充满探索和创造欲、充满自由精神和个体意识时代的来临。所以，《浮士德》表述了一种新的“人”的观念，浮士德可说是近代人的典型。歌德把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的探索与理解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还预告了一种个性更为张扬、自我更加放纵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来临。^{[5] 253}

歌德到晚年，随着年事增高，他的宗教观也像他的道德观一样发生了变化。他对不朽的看法渐渐改变，他承认了信仰的权利。^{[6] 908}所以，浮士德身上既有古希腊——罗马式的原欲型世俗人本意识，也有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基因。正如歌德自己所说：“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与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7] 19}这种“活力”就是浮士德自己所说的“神性”。在“神性”的牵引下，代表自然原欲的“魔性”在可能造恶的同时，更趋向于制善。浮士德的内心始终存在原欲与理性、善与恶、灵与肉、社会道德律令与自然欲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存在着“两个灵魂”的反向运动。他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自由的境界，既纵情享乐人生而又永不满足于短暂的世俗享乐，既满足自然欲望又不丧失理性约束，人因此进入了更高的理想境界。浮士德的个人追求散发的道德意识是与希伯来——基督教人本传统相联结的。浮士德心灵深处永难排解的善与恶的矛盾，体现了欧洲近代人在强调张扬自我、重视个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性的同时，又试图实现对人的道德理想的追寻，而对这种理想境界的追求事实上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这是人性的悖谬，人的永恒矛盾。歌德正是在揭示浮士德复杂丰富的人性内涵的过程中完成了他对启蒙理性的疏离与超越。

(四)

歌德是一个探索生命真谛、让生活本身融入艺术的近代人。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所有超级大师之中，他是最

具近代化气息的一位，因而在思想、风格和行为上也都是最复杂的一位。“任何一个有着自由精神的人，也都必须通过与大师的沟通才能意识到拜在他们门下的必要性。……任何一个反对道德形式主义而推崇道德重要性的人；任何一个反对国际敌对而崇尚世界和平的人；任何一个反对文学、生活、政治以及思想神秘主义而推崇共同吸取精华的人，都可以从此人身上获得无尽的灵感、生命力，进而从生活中看到希望。”^{[7] 270}

歌德的伟大，恰恰在于他的这种超越，不仅是对时代的超越，而且也是对历史的超越。歌德不仅仅属于德国，更属于整个世界。

[基金项目：陕西教育学院重点科研项目(2007KJ09Z)]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人民出版社, 1958.
- [2] [美] 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卷十), 卢梭与大革命(中册)[M]. 幼狮文化公司译, 东方出版社, 1999.
- [3] [德] 比学斯基. 歌德论, 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 [4] [英] 阿伦·布洛克, 董乐山译.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 三联书店, 1997.
- [5] 蒋承勇.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 人民出版社, 2005.
- [6] [丹麦] 勃兰克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 流亡文学[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7] [美] 约翰·阿尔伯特·梅西. 文学史纲[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8] 歌德, 杨武能译. 浮士德[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9] 朱光潜译. 歌德谈话录[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责任编辑:黎峰]